

和製漢詞在中國的傳播及影響： 以黃遵憲和梁啟超為中心

周聖來

提 要

中國傳統文學發展到清末民初，在性質和形式上出現了巨大改變，由“文言”過渡至“白話”，在形體上出現了新奇的創造。不僅如此，文學精神與作家創作的態度，同時也發生了很大的變化，其中一個重要的原因是在 20 世紀初，日本的明治維新時期，大量和製漢詞傳入中國，日本成為當時中國從外部世界獲取新知識的主要途徑。黃遵憲和梁啟超是在中日文化交流史上留下足跡的先驅者。黃遵憲駐日四年餘，著《日本國志》和《日本雜事詩》等書，最早向中國全面地介紹了日本。梁啟超在百日維新失敗後流亡日本，滯留十餘年，期間創辦《清議報》和《時務報》等報刊，推動中國社會的改革，在學術上深受日本影響。兩人對日文書籍內容的理解與東洋文化的推廣有著密切關係。本文擬通過黃遵憲和梁啟超兩人與日本的淵源，觀察並比較有關的文本及報刊，試圖探討他們對和製漢詞在中國的傳播起了哪些作用。

關鍵詞：和製漢詞 黃遵憲 梁啟超 文言 白話

一、引進東洋文化的先驅

(一) 黃遵憲的“文言一致”

中文的“文言一致”，日語又叫做“げんぶん いっち言文一致”。日本現代文學發起過一場言文一致運動，與中國現代白話文運動類似。“言文一致”指日語使口語和書面語一致，最初是在幕府末期由受西歐影響的學者們提出的。1853年4月在美國海軍提督柏利所率艦隊堅船利炮威脅之下被迫開港的日本，面臨淪陷為殖民地的危機，國內矛盾激化。為達到啓蒙開化目的，1868年前島密向幕府提交《漢字御廢止之義》^[1]，主張必須立即提高大眾的文化水準，拉開了“言文一致”的序幕。之後福澤諭吉寫文章時採用讀給他人聽而修改的方法，於明治時期形成風氣。1887年至1889年，二葉亭四迷用言文一致的文體寫了《浮雲》。其後尾崎紅葉、幸田露伴、森鷗外等分別在其作品中以和、洋、漢文三者結合，嘗試用新文體寫作，巖穀小波在童話作品中採用了言文一致體。1905年開始，夏目漱石的《我是貓》在《杜鵑》上連載，其通俗清新的文體引起了巨大反響。其後，田山花袋的《田舍教師》、島崎藤村的《破戒》都以言文一致體描繪人的內心世界，致使學術著作中也開始出現口語體。一般認為言文一致是日本建立現代國家的推動因素之一，在明治十年代後期成為重大問題被提上日程。“日語假名學會”（1883年）、“羅馬字學會”（1885年）的成立是在鹿鳴館時代，這時出現的“戲劇改良”、“詩歌改良”、“小說改良”等文學運動，在廣義上都包含在“言文一致”運動中^[2]。另外，前島密的進言明確標示了言文一致運動其根本在於文字改革和漢字的否定。隨著日本國內民族情緒的高漲，以及盛極一時的自由民權運動的啓蒙，西方現代文

學、思想及價值觀作為“文明”的範本被介紹到日本，如何適時地將改良和民主的思想由以往少數士人和知識分子的主張，推衍成為整個社會的主流思潮，成為開化的知識分子的課題。文學方面，隨著這股“洋風東漸”，西方文學思潮大量湧入日本。寫實主義、批判現實主義、浪漫主義、自然主義，相繼統領明治文藝界^[3]。日本引進西方文化，並使之隨日本的水土而發生了變異，從而使日本文化得到了進一步的補給。日本的言文一致運動對日本近現代文學的轉型產生了巨大而深刻的影響：它不僅提升了日本民族的總體文化素質，增強了國家社會的凝聚力，而且開闊了日本人的視野，擴大了日本人對外來文化的吸納能力。與此同時，具有日本民族特質的新文學的產生，反過來又進一步豐富了日本文化，增加了日本文化的厚重感，增強了日本文化的張力。

封建時代，由於存在著識字率低，性別、地域差別以及階級地位、身份差異等原因，各國語言普遍存在著談話體（口語）和書面體（書面語）兩個體系。在現代民族與國家建立過程中，二者走向統一，實現了“言”與“文”的一致，完成了文體的變革。在中國，早在鴉片戰爭前後，部分知識分子已經意識到放眼面向世界的重要性，西方文學、思想及價值觀成為中國知識分子心中“文明”的尺規，啓蒙開化的重要性日益為開化的知識分子所認識，中國歷史進入全新的思想啓蒙時代。晚清時期黃遵憲發起的“詩界革命”、梁啟超宣導的“新小說”在文學語言的變革方面取得初步成果，經過胡適、陳獨秀等人的鼓吹和推動，白話文運動漸漸引起重視^[4]。白話文運動以我手寫我口，就是書面語與口頭語相一致。文言一致則強調我們書寫的文字應該要表達我們說的話。“言文合一”這一思想，導源於文藝復興時期的西歐，他們在建立現代民族國家的過程中，改變古拉丁文所造成的言文分離狀態，以各自的方言土語為基礎，實現了書面語與口頭語的統一。黃遵憲《日本國志·學術志》“文學條”下用“外史

氏”名義所作的一段重要評論,提出了“言文合一”的理論主張,宣導以口頭語為基礎來形成書面語,為白話文學開闢了較為寬廣的途徑。“五四”宣導白話文學所依據的“言文合一”說,早在黃遵憲 1887 年定稿的《日本國志》中就已提出,黃遵憲明確指出“文字者,語言之所從出也”及“語言與文字合,則通文者多;語言與文字離,則通文者少”的道理^[5]。它比胡適的《文學改良芻議》、《建設的文學革命論》等同類論述,足足早了 30 年。但黃遵憲畢竟是位詩人,他似乎缺少將小說、戲曲亦視為文學正宗的意識,除了日語,他又未能通曉一兩種歐洲語言,這些局限終於使黃遵憲未能明確提出“白話文學運動”的主張。白話文最終戰勝文言文,是在 1919 年五四運動爆發,即白話文運動與反帝反封建的文學革命結合在一起之後。因此,無論是在中國還是日本,“文言一致”實際上也是各種複雜的政治、歷史等因素合力作用的結果。

黃遵憲找到了問題的根子:“語言與文字離,則通文者少;語言與文字合,則通文者多。”這可能是西歐各國文藝復興後社會進步很快,國勢趨於強盛的一個重要原因。黃遵憲得出的邏輯結論是:書面語不能死守古人定下的“文言”這種規矩,應該從今人的實際出發進行變革,讓它“明白曉暢”,與口頭語接近乃至合一^[6]。事實上,黃遵憲所關心的日本“文字語言之不相合”問題,也已在 1885—1887 年間由坪內逍遙、二葉亭四迷發動的文學革命所解決,他們宣導以口語寫文學作品,真正實行了“言文一致”^[7];可惜黃遵憲寫定《日本國志》時,早已離開了日本,因而可能不知道罷了。但黃遵憲所謂“更變一文體為適用於今,通行於俗者”,這種文體其實就是白話文。黃遵憲在《日本國志》中所鼓吹的“言文一致”的思想依然產生了很大的影響,尤其當清廷甲午戰敗,人們紛紛思考對手何以由一個小國突然變強,都希望從《日本國志》中尋找答案的時候,“言文合一”、“辦白話報”等措施也就成了變法維新的組成部分,聲勢猛然增

大。梁啟超後來在《小說叢話》中能夠說出：“文學之進化有一大關鍵，即由古語之文學變為俗語之文學是也。各國文學史之開展，靡不循此軌道。”其中就有黃遵憲最初的啟發和影響^[8]。黃遵憲本人晚年的詩作，較之早年“我手寫我口”突出“我”字的主張，也更有新的發展。他大量吸收俗語與民歌的成分，明白曉暢，活潑自然，又有韻味，力求朝“言文合一”的方向努力。

（二）黃遵憲的《日本國志》、 《日本雜事詩》及其詞彙

1877年，黃遵憲隨何如璋東渡出使日本，之後前往英國、美國、新加坡等地任外交官。駐外期間，他留心觀察所在國的事物，認為中國要革新自強，必須效法日本維新變法。期間撰寫《日本國志》，全書共四十卷，五十餘萬字，詳細論述日本變革的經過及其得失，藉以提出中國改革的主張。黃遵憲在日本期間，對深入研究日本的社會歷史負有強烈的使命感，認為身為外交官員，對日本的古今變遷種種情況應當了解，應當記述。他驚訝地發現，日本人和中國人對彼此的認識程度相差極其懸殊，日本人“類能讀中國之書，考中國之事”，記載研究中國的書籍不但數量可觀，而且詳實。反之，中國人對近鄰日本卻知之甚少，甚或茫然無知，因此將真實的日本展現給國人，亟不可緩。另外，明治維新帶給日本的重大的變化，更加促使黃遵憲決心寫作日本史，為此他刻意留心收集各方面的資料，詳細考察日本社會。他清楚地看到日本“進步之速，為古今萬國所未有”，中國要自強禦侮，“與其遠法歐西，必多轉折，曷若近法日本，速效可期”。他意在記述日本作為借鑒，警示國人。據薛福成所作序言，“採書至二百餘種，費日力至八九年”，完成了內容豐富、體系完善的《日本國志》，在當時堪稱是品質最上乘的日本史著作。

黃遵憲的《日本國志》，首次對日本的歷史與明治維新以後的現狀做了詳細、全面的介紹，是一個同時具有跨時間、跨語言、

跨文化、跨學科多重性的近代文本。黃遵憲利用古今日本的素材完成了《日本國志》的編碼。沈國威認為作為文本的《日本國志》，在生成的編碼上可以分為三種方式，分別是“徵引”、“翻譯”和“譯述”^[9]。書中一些來自於日本漢文體文獻的內容構成了《日本國志》的徵引部分，對於這些“徵引”素材的處理，有兩個方法，一是藉改動個別字句，統一敘述的視角；一是按照自己的價值觀對徵引內容進行篩選和取捨。此外就是那些反映明治以後日本變化的書籍，多用“和文”，黃遵憲在“凡例”中說：

維新以來，禮儀典章頗彬彬矣，然各官省之職制、章程、條教、號令，雖頗足徵引，而概用和文（即日本文，以漢字及日本字聯綴而成者也，日本每自稱為和國），不可勝譯，則徵今亦難。此採輯之難也。以他國之人，寓居日淺，語言不達，應對為煩，則詢訪難。以外國之地，襄助乏人，瀏覽所及，繕錄為勞，則抄撮亦難。此編纂之難也。既非耳目經見之書，又多名稱僻異之處，而其中事物之名，有以和文譯漢文者，有以英文譯和文再譯漢文者，或同字而異文，或有音而無義，則校讎亦頗為難。^[10]

從以上的敘述中可以了解到，能够直接利用的日本的漢語文獻並不太多，要利用這些資料必須借助翻譯，也就是將日語文獻翻譯成漢語，《日本國志》中有大量的翻譯部分。翻譯和徵引是兩個完全不同的文本生成過程。最後是譯述，譯述也不同于徵引，並不是簡單調整內容和語詞，而是作者對日語文獻加以綜合整理，進行重新表述。無論是“徵引”、“翻譯”或“譯述”，《日本國志》包括三個部分：1. 對日本固有情況的介紹；2. 對日本明治維新後所發生的變化的介紹；3. 作者的意見、評論。這三部分中，以第二部分引用的和製漢詞最多最廣泛，而且《日本國志》所引用的和製漢詞 80% 集中在“職官志”（行政）、“食貨志”（經濟）、“兵志”（軍事）、“刑法志”（法

律)和“學術志”(教育)這幾卷中^[11]。黃遵憲通過以上數個領域廣泛介紹日本的明治維新,明治時期誕生的和製漢詞自然在這幾卷中大量湧現。

黃遵憲為撰寫《日本國志》收集素材,同時寫作了《日本雜事詩》,在詩後附以注文,記述本事,記錄了在日本所見所聞的千姿百態的事物。該書起草於1878年,於次年謄清。《日本雜事詩》和《日本國志》這兩部書為同一系列,二者的中心內容都是在肯定明治維新以來日本社會的進步、政治的改革,以及經濟、科技、教育、文化飛速發展的成就。《日本雜事詩》涉及的範圍極為廣泛,它對日本的歷史和現狀,例如:日本的社會發展史、漢學史、西學史、中日關係史、西方國家與日本關係史,還有日本的天文地理、民情風俗、音樂舞蹈、醫農工商,特別是日本經由明治維新後在政治、經濟、軍事和文化教育等方面發生的變化,皆作了概要的敘述和介紹。我們可以把《日本雜事詩》視作是《日本國志》的詩歌版,在《日本雜事詩》的詩和注裏也可以發現不少和製漢詞的蹤迹,第一批的明治和製漢詞可以說是通過這兩個文本進入中國的。

以下詞彙,是對照《日本國志》和《日本雜事詩》的內容,並查閱明治時期的文獻以及辭典,抽出的表示外來概念部分的日語新詞語,其中包括和製漢詞。帶*的詞彙是被收錄在《漢語外來詞詞典》中的日語來源詞。

雙音節詞語						
印紙	衛生*	共和*	國會	國體*	政黨	議院*
改進	會計*	幹事*	解放*	藝術*	銀行*	公園*
汽船*	議員*	議長	會議	改選	會社*	後備
憲法*	刑法*	公判*	許可*	警視	警部	員警*
交番	金屬*	建築*	經費*	金額*	規模	假名*
化學*	課目	學科	公立*	教員	訓導	國旗

(續表)

雙音節詞語						
記者*	競馬	私立*	神道	石屬	證券*	參觀*
中將*	常備	選舉*	自由*	總理*	主義*	知識*
進步	紙幣	總裁	市場*	移民	體操*	內閣*
社會*	消防*	宗教*	定員	統計*	投票	民主*
麥酒*	物件	蒲團	保釋	法廷*	法律*	理事*
民權	民法*	予算*	予備	予審	洋服	相撲
雅樂*	鏡餅	門松	昆布*	權妻	猿樂*	雜煮
旦那	廣場*	落語	和歌	炮兵	聯隊	彈藥
越權	起訴	時限	終審	從犯	出廷*	上訴
職權	特權*	取消*	沒收	大將	經濟*	決算*
公債*	礦山	國債	財政	商業*	商務	政體
鐵道	學期	證書	大尉	哲學*	版權	模型
予科	留學	歷史	海軍	旗艦	勳章	軍屬
憲兵*	工兵	少尉*	少將*			
三音節詞語						
印刷局	共和黨*	國民軍	警視廳	出張所	常備兵*	消防局*
政治學	生物學	生理學	製造所	造幣場	制造物	綿織物
操練場	自由黨*	裁判所	徵兵令	統計表*	煉化石	博物館*
物理學*	封建制*	紡績所	民主黨*	郵便局	幼稚園	立憲黨
揚弓店	稻荷祭	壳捌所	大安壳	貸座敷	加追澳	祇園祭
島田髻	三味綫*	人力車*	數奇屋	大問屋	淡巴菰*	踏踏美*
無神髻	飛脚屋	兩替屋	料理屋	國事犯*	後備兵	被服課
近衛兵	員警官*	檢察官	原告人	裁判官	被告人	辯護人*
防疫法	營業稅	決算表*	資本金*	準備金	消防部*	總領事*
造船所	造幣局	地方稅	博覽會	副議長	保證金	煉鐵所
衛生局*	幾何學*	經濟學*	留學生	教導團	小學校	大學校
文學士*	法學士*	理學士*				

(續表)

四音節詞語						
士官學校*	師範學校	立憲政體*	小間物屋	現行犯罪	高等法院	治外法權
無期徒刑	自由自主*	民權自由*	野營演習	教科之書*	公立學校*	私立學校*
專門學校						

由上表可見，黃遵憲在其《日本國志》和《日本雜事詩》中，借用了大量的和製漢詞，其中包括 137 個雙音節詞、80 個三音節詞及 15 個四音節詞，共 232 個詞彙。作為介紹日本明治時期和製漢詞的先導，無論在數量上還是所涉及的專業領域上都是無出其右的。和製漢詞的傳播就是對外來詞彙的一種借用，而這種借用可以被視作黃遵憲個人的借用行爲，也可以是一種社會語言現象。這種“借用”不僅拉近了中文和日文的距離，而且拉近了中國固有文化和世界通行文化（主要是歐美的）的距離。

（三）梁啟超的語言意識

梁啟超在廣東省新會出生，母語為粵語（廣東話），因為地理上的距離，廣東話與以北京音為基礎的“北京官話”之間的區別並不僅僅是“口音”的問題了，甚至可以說兩者是截然不同的言語（方言）。1898 年 7 月 3 日，光緒皇帝召見梁啟超。按清朝慣例，舉人被皇帝召見通常會被賜予翰林，或者至少是內閣中書。然而以當時梁啟超的聲望，卻只被賜了個六品官，原因應該是梁啟超不會說官話，而光緒皇帝基本上聽不懂梁啟超的粵語。既然君臣對話形似雞同鴨講，縱然君王滿腔誠意，臣子滿腹經綸，也只能相顧茫然。因為語言的隔閡無法傾心暢談，光緒皇帝很不愉快，所以沒有重用梁啟超^[12]。據說梁氏當時方言口音濃重，把粵語的“孝”讀作京話的“好”、把“高”讀成“古”^[13]。粵語“孝”的發音是[hau³]，和官話“好”的發音近似；“高”在粵語的發音是[gou¹]，而“布”和“報”的粵語發音是相同的，都是容

易和官話的韻母相混淆。

梁啓超曾經在《亡友夏穗卿先生》裏這樣形容自己的“廣東腔”，

我十九歲始認得穗卿。……我當時說的純是“廣東官腔”，他的杭州腔又是終身不肯改的，我們交換談話很困難，但不久都互相了解了。^[14]

這裏的“廣東官腔”，並非指“廣東話”，而是指帶有廣東口音的北京官話。以粵語為母語者說北京官話時，因為口音，以及文法、詞彙等原因，會帶有很明顯的粵方言特徵，也就是一種所謂的“藍青官話”。俗話說：“天不怕，地不怕，只怕廣東人說官話。”就是指這種現象。梁啓超承認自己說的是“廣東官話”，證明他已經意識到這個問題。

中國知識分子認為，文言是中國語言的起源。就算在全國各地存在各種不同種類的方言，但是都共用相通的起源，因為其言語構造同屬中華民族^[15]。站在梁啓超的立場，故鄉和粵語是相互聯繫的，中國和文言是相互聯繫的，從而，只要能夠使用文言，就算不擅長官話，也不會有損自己作為漢民族一員的自尊。官話的重要性在於其流通的功能，例如，高鳳謙認為：“外國用英語為主，以前此譯書多用英文也；中國以京音為主，以天下所通行也。”^[16]當時很多外國書籍的翻譯工作多是出自閩粵地區的譯者之手，雖然他們有很多“方音”，但只要能夠廣泛通行，不管翻譯出來的是閩音還是粵音都不成問題。對於梁啓超而言，“官話”只是一種“超民族語”(Les langues véhiculaires)^[17]，所以提倡白話文並不是企圖統合文言和粵語，是為了讓“超民族語”的“官話”不僅作為一種口語，並且成為一種書面語流傳通行。這樣，無論是傳統文言，還是粵語，都能夠世代承傳下去。1896年，沈學在《申報》以及《時務報》上發表了評論梁啓超的《沈氏音書序》的文章：

天下之事理二，一曰質，一曰文。文者，美觀而不適用，質者，適用而不美觀。中國文字畸於形，宜於通人博士，箋注詞章，文家言也。外國文字畸於聲，宜於婦人孺子，日用飲食，質家言也。……西人既有希臘拉丁之字，可以稽古，以待上才，複有英法各國方音，可以通今，以逮下學。……此後中土文字，於文質兩統，可不偏廢，文與言合，而讀書識字之智氏，可以日多矣。^[18]

當時他們把中國跟西方國家以及日本相比，感到處處落後。他們看到這些國家富強的一個重要原因在教育普及，而它們的教育普及大多得益於文字簡易，也就是“切音為字”。切音為字的拼音文字有三大優點：1. 容易學，“字母與切法習完，凡字無師能自讀”；2. 容易記，“基於字話一律，則讀於口遂即達於心”；3. 容易寫，“基於字畫簡易，則易於習認，亦即易於捉筆”。日本雖然也用漢字，還發明了一套表音的“假名”文字，與漢字合用，但日語中的漢字只表實詞，虛詞和詞尾等都用假名表示，同時還用假名給漢字注音，這樣大大便利了文字的學習。於是當時一些有維新思想的人也紛紛創造中國的拼音文字，用來輔助漢字和普及教育。《盛世母音》提倡以速記符號製作的切音字代替漢字，並主張把字從左向右書寫。1896年，梁啟超為《盛世母音》作序時，就提到“吾鄉黃君公度之言曰：語言與文字離，則通文者少；語言與文字合，則通文者多”^[19]。同年，梁啟超在《變法通議·論幼學》中指出：“古人文字與語言合，今人文字與語言離。”^[20]1902年，梁啟超在譯作《十五小豪傑》的評語中再次更明確地強調：“……語言文學分離為中國文學最不便之一端，而文界革命非易言也！”梁啟超這種從語言問題入手，著眼於文體、文學乃至文化改良的基本思路，不僅與改良派整體性的變法維新思想相一致，而且也與“五四”時期的白話文運動有著直接的淵源關係。他認為，文言文與白話文的關係，就如同漢字

和切音的關係一樣，也就是“文”和“質”的關係。“質”是指以實用為宗旨，正因為有“文”，纔需要有實用的“質”來貫徹。同樣，日語對梁啟超而言，也是一門“質”的語言。

(四) 梁啟超的《和文漢讀法》

梁啟超經常在其著作中論及日語，這些論述大致分為兩個方向，一種是日本人的日語，另一種是中國人的日語。眾所周知，梁啟超在亡命日本前，對日本的了解以及日語的認識來自黃遵憲，例如《變法通議》論幼學的“說部書”：

日本創伊呂波等文字四十六字母，別以平假名、片假名，操其土語以輔漢文，故識字、讀書、閱報之人日多焉。今即未能如是，但使專用今之俗語，有音有字者以著一書，則解者必多，而讀者當亦愈夥。

日語裏有假名字母，因此日人識字率高。在中國，就算不能立刻製造字母，也應該用口語與文書一致的俗語寫文著書。梁啟超最初就是從黃遵憲的《日本國志》中得知日本的假名文字。黃遵憲曾說過“日本之語言，其音少”，在夾注中又說“土音只有四十七音，四十七音又不出支、微、歌、麻四韻”。日語的假名文字提高了日本人的識字率，啟發了梁啟超對白話文的提倡，因為日語能夠方便地轉化成白話文。

從時間上看，第一次公開提出以譯日文書的方式引進西方新知識建議的應該是梁啟超。1897年7月，梁啟超在刊登於《時務報》上的《論譯書》一文的末尾寫道：

日本與我為同文之國，自昔行用漢文。自和文肇興，而平假名、片假名等，始與漢文相雜廁，然漢文猶居十六七。日本自維新以後，銳意西學，所翻彼中之書。要者略備。其本國新著之書，亦多可觀。今誠能習日文以譯日書，用力甚少，而獲益甚巨。計日文之易成，約有數端：音少，一也；音

皆中之所有，無棘刺扞格之音，二也；文法疏闊，三也；名物象事，多與中土相同，四也；漢文居十六七，五也。故黃君公度謂可不學而能，苟能強記半歲，無不盡通者。以此視西文，抑又事半功倍也。^[21]

音節數少、日語有的發音中文全有、文法不拘、名稱和概念與中文的相同、漢文占六七成，以上對日語的認識幾乎都是以黃遵憲的《日本國志》為依歸。其中最為其強調的就是“同文”——也就是漢字的使用。梁啟超在其《讀日本書目志書後》中更為明確地指出：

且日本文字猶吾文字也，但稍雜空海之伊呂波文十之三耳。泰西諸學之書，其精者日人已略譯之矣。吾因其成功而用之，是吾以泰西為牛，日本為農夫，而吾坐而食之。費不千萬金，而要書畢集矣。使明敏士人，習其文字，數月而通矣。於是盡譯其書。^[22]

他認為能經由日語獲得西洋學術的精華，這種思想，直至他流亡日本，在日語環境下生活以後，也一直没有改變。他在《論學日本文之益》裏強調了學習日語的好處，認為“學日本文者，一年可成。作日本文者，數日而小成，數月而大成”^[23]。但梁啟超學習日語的最大、最終目的並非為了流利地用日語說話，而是希望通過日文書籍了解西方的學術知識，因此必須學會看懂日文的方法。梁啟超發明了一套具體的解讀方法，他和留學生羅普在翻譯《佳人之奇遇》時，使用過這個方法。當時日本人有一套漢文訓讀法，按照日語語法，在改變語句順序的同時讀出漢文，還有相關的“複文”課程。日本人理解漢文的方法似乎啟發了梁啟超，他認為中國人只要把日文文章用顛倒地方法讀出，就可理解其意。例如漢語的“讀書”，日語是“書ヲ讀ム”；漢語的“飲水”，日語是“水ヲ飲ム”。其他句法，皆以此為例。

日本成城大學的陳力衛教授在其發表的《“同文同種”的幻

覺：梁啟超〈和文漢讀法〉的改版過程與日本詞典〈言海〉》一文中，對於《和文漢讀法》作出了詳細地論述。他在該文第四節中以《和文漢讀法》對語言學產生的影響為中心，在“對辭典的影響”及“對文體的變化產生連携”兩個方面進行了分析^[24]。對前者而言，《和文漢讀法》的流行加強了學習日語的動機，造就了“日語速成教育”的出現。以蔡元培為例，當時他作為一個教育工作者，成功把這種日語學習的方法引進上海南洋公學；在出版界，無論是日本還是中國，速成教科書和各種各樣的日語學習小冊子大量在市面出現。對於後者“對文體的變化產生連携”，作者以當時在日本留學的魯迅和周作人的見解作為論據，指出在日本的明治時代及之前，日中同文既是時代的特徵，當時的日語文體亦能以《和文漢讀法》解讀。不過，明治以後，日語語法出現了明顯地變化，《和文漢讀法》不再適用。陳氏在論文的結尾指出：“我們應該如何看待由梁啟超為首的近代中國文人及其日本體驗，或者如何評估漢語和日語之間的異同，由《和文漢讀法》這本小冊子當時被增印的數量和普及的程度可見端倪。”不難想像當時大家死抓住“同文”不放，全力運用並發揮自己本身的漢語能力去理解日語。無論是什麼內容，反正眼前的任務就是盡快把日語變成漢語，結果因為半生不熟的理解導致消化不良，而成為了那個時代特有的產物。

梁氏這本小書基本上抓住了日語“和漢混合體”的一些主要規律，雖然漏略草率殊多，但也確實為當時有志新學的中國知識分子提供了學習日語的快捷方式。充分利用日語作為一種“策騎”的工具，通過日語的學習間接汲取西洋知識和技術。此書在當時盛行一時，充分體現了晚清知識界對求取新知的渴望，迎合了希望在短時期內學好日語的人的心理，起到了辭典輔助資料的作用。梁啟超對於語言的認識，是基於“粵語和廣東人之間關係密切”的基礎上證明了“文言文是漢民族的一部分”，從而超越這個框架，成為一種先驗的存在。至於《和文漢讀法》

這本小冊子的另一個正面影響，夏曉虹認為：“《和文漢讀法》的意義主要不在於它作為一種日文學習方法有多大的應用價值，而在於它從一個側面反映了中國人通過日本學習西方文化的普遍熱情和開放心態。”^[25]同時，官話、白話文、切音字、日語和梁啟超的新文體，也完全成為了一種有效的構成語言的元素，清末民初中國的語言空間正是由“故鄉話”、“通行語”和“傳統語”構建而成。這個三層構造的語言空間在中國的近代化過程中，其框架逐漸重組，各自成為中國“漢語”中的一部分被社會大眾重新認識和接受。梁啟超在當時闡明日語的效用，提倡白話文的時候，充分發揮了這些元素的功能，對推動近代中國“語言”、“文字”、“文學”的改革，具有極大的貢獻和意義。

（五）中日兩國“同文同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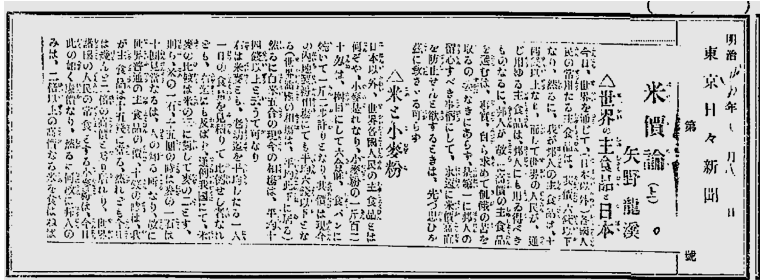
由於梁啟超大力提倡學習日語，介紹《和文漢讀法》這本日語學習工具書，強調日語和中文屬“同文”。所謂的“同文”，並非指漢語和日語是同一種語言，而是指中國和日本都使用漢字。事實上，明治時期大量使用漢語，除了“て”、“に”、“を”、“は”等助詞以外，名詞、動詞、形容詞，甚至連副詞也大量使用漢字點綴，這不僅令中國人有種親切感，而且在閱讀理解時十分方便。梁啟超在其《論學日本文之益》說道：

日本文漢字居十之七八，其專用假名，不用漢字者，惟脈絡詞及語助詞等耳。其文法常以實字在句首，虛字在句末。通其例而頭顛倒讀之，將其脈絡詞、語助詞之通行者，標而出之，習視之而熟記之，則已可讀書而無窒礙矣。余輯有《和文漢讀法》一書，學者讀之，直不費俄頃之腦力，而所得已無量矣。^[26]

就是說，中國人能夠迅速學好日語。梁氏還為中國留學生發明了“和文漢讀法”，利用了“同文”的優勢，找出中文和日語文法

上的差異點,進而更容易地學習日語。

例如,以下是1912年《東京日日新聞》中有關“米價論”的報導:



世界の主食品と日本

今日、世界を通じて、(日本以外)各国人民の常用たる主食品は、其価六銭以下なり、然るに、我が邦人の主食品は、十四銭以上なり、而して世界の人民が、通じ用ゆる主食品は、邦人にも用い得べきものなるに、邦人が故に高価の主食品を選むは、事実、自ら求めて飢餓の苦を取るの姿なきにあらず、是第一に邦人の留心すべき事柄にして、永遠に米価高直を防止せんと欲するとき、先ず思いを茲に到さざる可らず…

漢譯：今天，世界上，日本以外，各國人民的常用主食品，其價格是在六錢以下，然而，我國人民的主食品，是在十四錢以上。世界人民共通使用的主食品，國人也應同樣取得。國人何故要選用高價的主食品，事實上是自討苦吃。首先，必須留意的事情是，如欲永遠防止米價的高騰，首先在這裏必須思考……

從例文中，我們不難發現，那個時期的日語，幾乎都用漢字書寫，也就是所謂的“漢文體”文章，尤其是當時日本的公文及以政論為主體的報紙、雜誌等。對中國人來說，只要理解文中的

漢字，基本上可以用直譯的形式去理解其大概意思。雖然這種形式的漢譯，多少感到有些生硬，但句法結構，已經基本上接近中文了。這對於肩負著維新歷史使命，廣泛尋求救國良方的留學生來說，可以說是一種極大的便利。但筆者作為一個曾經的日語學習者，對於梁啟超所說“學日本文者，數日而小成，數月而大成，日本之學，已盡為我有矣”，不敢苟同。如以下例文，出自日語古典小說《枕草子》第二段：

正月。一日はまいて。空のけしきもうらうらと、めづらしう霞こめたるに、世にありとある人はみな、姿かたち心ことに繕ひ、君をも我をも祝ひなどしたるさま、ことにをかし。七日。雪間の若菜摘み、青やかにて、例はさしもさるもの、目近からぬところに、持て騒ぎたるこそ、をかしけれ^[27]。

漢譯：正月元旦天氣特別晴朗，而且很少有的出現霞彩，世間所有的人都整飭衣裳容貌，格外用心，對於主上和自身致祝賀之意，是特有意思的事情。正月七日，去摘了雪下青青初長的嫩菜，這些都是在宮裏不常見的東西，拿了傳觀，很是熱鬧，是極有意思的事情。

以上日語中雖然也夾雜漢字，但文章整體結構以和語為主，或稱為“和文體”文章，這類文章別說是不懂日語的人，就算是一般的日語學習者，也不能輕易理解文意。

由此推論，當時梁啟超等文人，包括後期大量的赴日留學生們，能够在到達日本後不久就展開日語書籍的翻譯工作，除了明治時期的日語在語法上已經“言文合一”，使用近似現代的白話文或口語體寫作之外，更重要的原因是明治和製漢詞的出現令留學生能够更容易理解日語文章的大意。這也令他們翻譯的對象集中在用漢文體書寫的、大量和製漢詞出現的書籍、報刊以及雜誌。因此，在這段時期裏，各種報刊、雜誌和日語書籍的翻譯

活動以及文學創作成為和製漢詞進入中國的媒介之一。

二、報刊中的和製漢詞

“和製漢詞”一詞是日語語言學範籌中的專業術語,指的是在 19 世紀末 20 世紀初,即日本的明治前後、中國的清末民初時期,從日本回流中國、在中文使用的“源自日語的外來語”。和製漢詞的成立,須具備以下三項條件:一、音讀漢語;二、漢籍(中文)中沒有的漢語;三、在日本製造的漢語。另外,“漢籍用典出處的有無”亦是判斷“和製漢詞”的關鍵^[28]。山田孝雄認為:“一種是本來的漢語,或者是源自中國文獻,由中國傳入日本;另一種是在本國製造的漢語,也就是以漢語為基礎在日本製造的漢語,或者用音讀的方式在日本製造的漢語。”^[29]日本人把中國古漢語重新改造,賦於其新的含意,因此日語以“和製漢語(わせいかんご)”(wasei kango)稱之。本人認為應翻譯為“和製漢詞”,或細分為“明治和製漢詞”^[30],這樣亦符合該詞所具有的漢語含義及語法。

上文所述,新聞、雜誌等定期刊物發揮了媒介的作用,把日本的語言、文字、文學帶進中國。以下以《實學報》、《時務報》和《清議報》這三份與日本新聞有緊密關聯的報刊為觀察對象,通過分析相關報刊文章內出現的詞彙的特徵,以及語義的比較,闡述清末和製漢詞傳入中國的實際狀況。

(一) 《實學報》

《實學報》(《実學報》)於 1897 年 8 月 22 日創刊,至 1898 年 1 月期間在上海發行。總理為王仁俊,總撰述為章太炎。《實學報》以“實學”為名,所載的“實學”即新知識,文章譯自英、法、日等國報刊,也刊登一些國內學者的自然科學研究心得。雖然發行時間不足半年,但被評為是 19 世紀末維新運動發生期間

“最足以動守舊者之聽，且足以奪維新者之心”的定期刊物。

《實學報》收錄有關“實學”的文章，其他內容還包括天文、地理、人物學和物理學 4 個分類，是一份學術性報紙刊物。在其第三期還刊登了全國各地的發售地點，包括北京、香港、天津、南京、寧波、杭州等國內 36 處，以及海外地區的英、美兩國^[31]。關於《實學報》的讀者群，馬西亞認為“在當時，教育只適於文人學士，而且完全以漢語典籍為基礎”^[32]，回顧 1890 年代中國的教育狀況，對於像《實學報》這種類型的刊物，未曾接觸過書面語的庶民階層通常不具有足夠的閱讀能力，所以《實學報》的讀者應該是知識人，或是具有相當漢語基礎的人。而《實學報》刊登的日語翻譯文章，其來源出處繁多，例如《大阪朝日新聞》、《時事新聞》、《中外商業新報》、《東京日日新聞》、《神戶又新日報》、《東京經濟雜誌》等。翻譯文章在內容方面包括：經濟、外交、交通、通訊、政治、軍事、社會、文化、教育等新聞報導，而且有關的資訊內容涉及世界各地。由此明顯可見負責人的編撰意圖，就是通過翻譯充滿近代要素的日本新聞報導，把西方文明傳入中國，從而帶動中國的現代化。

作為清末時期第一批出現的新媒體，《實學報》響應了當時中國社會各界對現代化的期待和追求，在報紙上大量翻譯了有關日本“洋學”的新聞，同時也引進了代表新概念、新事物和新意識的新詞語——明治和製漢詞。要分辨這些詞語的出處，到底是來自中文還是日語，本來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何況這些詞語包括由 17 世紀歐洲傳教士登陸中國後，與中國知識分子共同合作翻譯的，代表西方文明的新概念語——明清新製譯語；還有明治時期，由日本的知識分子憑自己的努力發明創作的和製漢詞。由於時間長、範圍廣、種類多，更增大了究明“真相”的難度。根據秦春芳的《有關近代漢語裏日語漢字詞彙借用的研究——以定期刊物的翻譯文章為中心》（《近代中国語における日本漢字語借用に関する研究——定期刊行物の翻訳記事を中

心に——》)的調查,結果表明,《實學報》裏出現的日語借詞,或和製漢詞,大約有 813 個。按照詞彙所屬範圍,可分為 7 個種類,另外,約有 100 個日語詞彙現在已經不再流通使用,成為“死語”^[33]。

詞彙分類	數量
表示抽象關係	207
表示人類活動的主體	183
表示人類活動(精神及行爲)	303
表示物品及用具	73
表示自然界及自然現象	46
死語	100
	合計: 813

以上由日本輸入中國的 813 個和製漢詞,很快融入中國社會,進入辭典和文學作品。《新名詞訓纂》中收錄,曾在《實學報》裏出現的和製漢詞就有 64 個,占總數的 8%,例如:“演說”、“改良”、“革命”、“教育”、“經濟”、“研究”、“思想”、“專制”、“地軸”、“獨立”等;《辭源》中收錄了 193 個,占 24% 左右,例如:“演說”、“科學”、“議會”、“國庫”、“裁判”、“社會”、“自由”、“大統領”、“博覽會”等;還有《漢語大詞典》也收錄了大量曾在《實學報》裏出現的和製漢詞,例如:“假設”、“試驗”、“新聞”等。

文學作品方面,曾在日本留學,有中國現代文學之父之稱的魯迅^[34],他在 1918 年 4 月至 1935 年 12 月期間完成的短篇小說集《吶喊》、《彷徨》、《故事新編》、《墳》,在中國文學史上享有極高的地位。上野惠司認為,上述作品是魯迅的文學代表作,而且也是“五四”白話文學的典範,具有很高的參考價值,能夠成為語言資料研究的資料素材。魯迅在這四個文集中使用了 231 個曾經在《實學報》裏出現的和製漢詞,占了總數的 28%,見下表:

a 行	影響	維新	延長	歐米	萎縮	意見	醫學
	應用						
ka 行	現實	現象	各種	起源	偶然	原因	根基
	危險	景況	傾向	困難	開會	改革	改正
	機會	期限	近年	界綫	形態	外國人	外人
	開戰	改良	革新	擴張	革命	更正	學者
	國民	教授	軍醫	公使	校長	國家	學校
	銀行	公園	工廠	機關	恐慌	回顧	經驗
	研究	科學	學問	規則	記載	廣告	國歌
	加入	協商	軍事	契約	勸告	教育	經濟
	開發	工業	礦業	工商	合成	交通	原料
	外套	勳章	機械	眼光	氣象	血液	健康
	確實	緊要	公平				
sa 行	實際	式樣	種類	條件	相互	殘存	絕迹
	衝突	進步	增加	阻止	卒業	時間	時期
	喪失	狀況	盛況	性質	整頓	世紀	全國
	全部	自己	青年	種族	士官	師範	總長
	諸國	師範學校	社會	世界	政府	信用	選擇
	實驗	專門	思想	主義	手法	雜誌	新聞
	聲明	作為	施行	性情	責任	贊成	招待
	勝利	財政	裁判	自由	專制	資財	資本
	收成	需要	節省	佔領	必需	事業	製造
	相等	相同	重大	新式	重要		
ta 行	地位	適用	撤去	注入	通過	提出	同時
	中央	東方	當局者	大學	中學	中學校	圖書館
	同情	斷言	討論	圖畫	獨創	墮落	地雷
	彈藥	潮流	動植物	頭部	傳染	直接	
na 行	農行	女學校	認定	獨立	熱心		

(續表)

ha 行	秘密	品格	便利	發達	變化	募集	分佈
	本地	美術家	版圖	本國	反省	抱負	發明
	把握	方針	方法	發見	表示	博士	發表
	報告	文化	文明	兵事	報償	物品	炮臺
	病毒	病狀	普通	必要			
ma 行	名譽	迷信	名目	美術			
ra 行	流露	螺旋	兩國	流行	歷史	勞動	利益
ya 行	欲望	野心	要領	用法			

可見,經《實學報》介紹傳入中國的和製漢詞,大部分在 20 世紀前葉經由辭典及文學作品的引用後在中國“登陸”,其首先被一批知識分子所接受,並逐漸流傳開去。

(二)《時務報》

《時務報》於 1896 年 8 月 9 日創刊於上海,每期 20 餘頁,約三到四萬字,直至 1898 年 8 月停刊,共出 69 期,是晚清維新運動中影響較大的國人自辦報刊,鼓吹仿效日本明治維新,引進近代思想和提倡變法。創辦人為黃遵憲、汪康年及梁啟超等。梁啟超在《時務報》創刊號上發表《論報館有益於國事》的文章,後來成為中國新聞史研究的經典之作。《時務報》在梁啟超主持期間,成為維新派的宣傳機關和聯絡機關,產生過巨大的影響。該報最大銷量曾達 17,000 份,成為當時發行量最高的維新報刊。梁啟超後來自述說:

一時風靡海內,數月之間,銷行至萬餘份,為中國有報以來所未有。舉國趨之,如飲狂泉。^[35]

《時務報》中有專門翻譯外國新聞的“域外報譯”專欄,約占整體文章的一半,其中的“東方報譯”一欄,翻譯日本的新聞報

導，由日本漢學家古城貞吉主持，欄中 594 篇報導是出自古城一人手筆。這個專欄無疑是中國戊戌變法時期日本新名詞傳入中國的重要渠道之一，而且由日本人親手“輸入”。讀者方面，《時務報》和《實學報》、《清議報》相似，以全國各地的“官吏”、“士子”、“鄉紳”為對象，按照當時中國的教育狀況和社會情況，讀者都屬於“統治階層”或“知識階層”。《時務報》和《清議報》的文章來源及消息出處大致相同，有 25—30 種左右，與《實學報》的來源出處相比較，三者參考最頻繁的就是《東京日日新聞》、《大阪朝日新聞》，其他還有《國民新報》、《日本新報》、《時事新聞》、《時事新報》等日本報章。《時務報》集中介紹有關政治和外交的報導，例如有關政治政黨、國家體制、共產主義運動方面的詞彙是由此報首先傳入中國的。

中國到 19 世紀末為止，由清政府官方主辦的翻譯機關翻譯或西方傳教士傳入的“西學”，一直只局限在工業生產技術等自然科學與宗教的領域，鮮有關於其他領域的知識。《時務報》下意識地把介紹“西學”的重點，放在政治、法律等人文科學的領域。不過，介紹新的知識體系，需要新的詞彙，特別是相關的“新名詞”。但是，作為一個傳播新知識的媒體，中國的古漢語和文言文，無論是在文體或詞彙方面，都不具備相關的條件。因此，不難想像，當時《時務報》的執筆者和翻譯者在文體及用詞上是遭遇了極大的困難。《時務報》最初的主筆是梁啟超，他的宗旨是“不避日本輸入的新名詞”，《時務報》的文體被稱為“時務文體”，對當時的讀者而言，這些都是嶄新的事物。因此，“時務文體”再加上大量輸入中國的“新名詞”，不僅為中國的知識界帶來了新的概念和思想，而且對中國舊有的文體產生了巨大的影響。由於“東方報譯”的文章出處是日本的新聞報導，翻譯者又是日本人，這些要素加在一起，都成為了和製漢詞在《時務報》大量出現的原因。《時務報》的專欄“東方報譯”，翻譯引進中國的“新名詞”數大約有 600 個左右^[36]，雖然這 600 多個詞彙

加拿大排斥華人
譯時事報西九月
加拿大州民惡華工之獲奪利權也欲擠斥之日久矣業者議抽上陸稅五十金幣
以為未足暢其所欲也遂上書於加拿大議會書曰加拿大議會曾據中人移住法
條文第四十八項四十九項及七十一項抽中人入國稅五十元以杜絕華工矣然
所定稅則華民猶復輕之而來游者如故竊惡美國之股繁為彼族所傾奪而最受
其害者則為班古巴麻抑中人之來本州本無歸化輸誠之念不曾染我風俗之美
又鮮留意於德行交誼及衛生之事所汲汲者為謀衣食而已不逮歐洲下等之人
其初來也既涉重洋艱字蓬梗既入境也服賤工得賤價傾壓白人自以為得計焉
意者美國政府苛制法律禁止其來端為此也英屬喀羅比阿州苦中人徙居抽上
陸稅五百元亦為之故則吾州亦宜倣英例徵中人稅五百元所冀速定條例拯
救勞工毋為中人所荼毒幸甚幸甚

並非全部都是和製漢詞，但由此可窺見在日語詞彙傳入中國的過程中，現代漢語詞彙以及現代漢語文體是如何通過對日語的借用、對抗、融合、排斥等最終落實成形的。這些詞彙的分佈領域極為廣泛，包括經濟、政治、外交、教育、交通、軍事、貿易、外交、礦產物等。例如：“演說”、“軍艦”、“君主專制”、“教育”、“國庫”、“殖民地”、“造幣局”、“銀行”、“關係”等。下面來看看在《時務報》“東方報譯”一欄的文章中出現、并被《漢語外來詞詞典》確認為借自日語的和製漢詞。

例如：《時務報》刊登的

日本《時事報》翻譯文章《加拿大排斥華人》，就使用了不少和製漢詞，其中如：“……以未足暢其所欲也，遂上書於加拿大議會，書曰：加拿大議會曾據《中人移住法》條文第四十八項、四十九項及七十一項，抽中人入國稅五十元，以杜絕華工矣。”其中的“議會”一詞，對應歐美詞彙的 *parliament*（英語）、*chambre*（法語）和 *Volkvertretung*（德語），是介紹西洋政治制度的一個日語譯詞。此詞日本在明治十年左右，經過自由民權運動以後，最初在《明六雜誌》上和“議院、議員、國會”等詞共同登場。可是“議會”一詞，其雛型來自“議院”，最初是由中國傳入日本的。19世紀初期的中國洋學書《東西洋考每月統計傳》（1833—1838）裏，已經有“爵房、鄉紳房、上房、下房”的說法。後來傳教士偉烈亞

力(A. Wylie)編纂的雜誌《六合叢談》(1857—1858),曾在24處使用“議院”一詞,例如:“瑞顛國舊設議院四”、“正月九日英辟議院”。《六合叢談》後來傳入日本,在《英和辭典·附音插圖英和字彙》裏,作為對應“House”的譯語^[37]。後來,由於日本國會的設立和憲法的制定,“議會”在日本“落地生根”,不久“回傳”中國。

在另一篇翻譯文章中:



中:“主銀黨以西部諸州為根據,其壟斷銀幣,全賴該地方銀行為接濟。而該銀行等……”“銀行”一詞,在現代漢語裏是“辦理存款、放款、匯兌、儲蓄等業務的金融機構”^[38]。在古代中國,和“銀行”概念一致的詞語,是“銀號”。銀號是古代中國經營貨幣兌換和存放款業務的一種金融機構,與“錢莊”的名稱並存,北方的“銀號”就是南方的“錢莊”,只是叫法不同,性質都一樣。“Bank”的語源是12世紀時,在當時的世界貿易、文化中心——北義大利誕生,意指兌換錢幣的商店。明治和製漢詞“銀行”這個名字,最初是日本根據美國的“國立銀行法”(National Bank Act),在1872年制定“國立銀行條例”時,作為對應英語的“Bank”所產生的譯語。據說當時大批學者經過協議討論,因為是處理“金、銀”的店,所以最初使用在漢語中和“店”同義的“行”字,譯為“金行”、“銀行”兩個版本,最終選擇了語感較佳的後者^[39]。清末



時期，中國的翻譯家嚴復曾經以“版克”音譯英語的“Bank”，但最終不敵日譯的“銀行”。

這篇文章中：“……並知東方政事與歐洲甚有關係……”的“關係”一詞，在古代漢語表示“關聯、牽涉”的意思。例如：《宣和遺事》前集：“這個陰陽，都關係著皇帝一人心術之邪正是也。”^[40]《金瓶梅詞話》第六五回：“哥教唱此詞，關係心間之事，莫非想起過世的嫂子來。”^[41]但直至 19 世

紀末，此詞仍沒有現代漢語中表示“人和人、人和事物或事物之間的相互作用、相互聯繫的狀態或性質”的意思。中世以後，這個詞語傳入日本，最初在《英和對譯袖珍辭書》裏出現，作為對應英語“relation”的譯語。後來，其他英語辭典，例如《哲學字彙》內也收錄了此詞。《時務報》內出現的“關係”一詞，既有如“日露關係”、“英仏關係”等表示“relation”的用法，也有類似古代漢語表示“帶來重大影響、結果”的用法。

(三) 《清議報》

《清議報》是由梁啟超等維新人士於 1898 年 12 月 23 日在日本橫濱創辦的旬刊。旅日僑商馮鏡如為出資人和發行人，梁啟超為實際主持者，麥孟華和歐榘甲輔助。此報以“主持清議，開發民智”為宗旨，是中國首個設有新聞評論專欄的報紙，專欄

名為“國聞短評”。《清議報》後來被認為是戊戌政變失敗後康有為、梁啟超在海外所創的第一個輿論陣地，通過推崇光緒帝提倡“維新”和強調“民權”的重要性，希望通過“哲理”達到啓蒙國民的目的。清議報出滿一百冊後，梁啟超撰文概括該報特色：一曰“倡民權”，二曰“衍公理”，三曰“明朝局”，四曰“厲國耻”。並指出：“此四者，實惟我《清議報》之脈絡神髓，一言以蔽之曰：廣民智振民氣而已。”在第 100 期上，梁啟超發表《本館第一百冊祝辭並論報館之責任及本館之經歷》，內設“西報譯篇”和“東報譯篇”兩個專欄，專門介紹世界大事。為表示紀念，第 100 期改為特大號。結果特大號剛剛出版，報館就遭遇火災而被迫停刊。

《清議報》和《時務報》，兩者都是由梁啟超主持，在日本發行，設有專門翻譯世界大事的外國新聞專欄。除了外國新聞的翻譯專欄以外，此報還有梁啟超自己的文章和“譯書附錄”的譯文。《清議報》的翻譯專欄和《時務報》的“東方報譯”、“西方報譯”相似，不過《時務報》的日語翻譯是由古城貞吉擔任，《清議報》就沒有固定的日語翻譯，估計翻譯者不止一人。新聞報導的來源基本上和《時務報》相同，日語報紙有 25 份左右，英語的有 12 份左右。其中，來自《東京日日新聞》、《大阪朝日新聞》、《時事新報》的新聞數量最多。梁啟超的文章則大致可分為四類：第一類為政治論說文，例如：1899 年 2 月的《商會議》、同年 4 月的《論學日本文之益》、9 月的《論中國與歐洲國體異同》等，三年中此類文章發表超過 70 篇。第二類是“政治學譚”專欄，這個專欄連載了由梁啟超翻譯，有關政治的長篇譯文，例如在 1899 年 3 至 9 月期間連載的《國家論》、同年 4 月經 2 期刊登的《各國憲法異同論》、1901 年 11 至 12 月分 6 期連載的《政治學案》。第三類是名為“飲冰室自由書”的專欄，這個專欄是梁啟超以自由的文體書寫，把平時想到的感想記錄下來的雜文，合計 46 篇。最後一類是政治小說，例如在《清

議報》第 1 至 35 期翻譯連載的《佳人奇遇》。朱京偉^[42]在《清議報》中“外國新聞的翻譯專欄”和“譯書附錄”的譯文中抽出 1 190 個日語漢字,按雙音節詞、三音節詞和四音節詞分別作整理,雖然沒有按照詞義進行歸類,但從中可見以下詞語出現頻率較高:

運動	社會學	美術品	共和政治	病院	稅關	技師
妥協	外交政策	勳章	領土	雜誌	機關	任務
發信	經濟	科學	列強	艦隊	資本家	反對
現象	自由貿易	民主主義	感覺	理由	增稅	事務員

以上例詞可見,在《清議報》中使用最多的是有關經濟、自由、政治、外交、教育、交通、軍事、貿易等領域的詞彙。此外還包括以“力”、“家”、“者”作詞尾的三音節詞語,例如:

營業家	改革家	外交家	教育家	銀行家	工業家
愛國者	戰死者	代表者	哲學者	當局者	勞動者
活動力	經濟力	生產力	團結力	反動力	原動力

還有首次在中文新聞文章中使用兩個雙音節詞語組成的四音節詞語,例如:

國際關係	國家觀念	自由貿易	殖民主義
經濟學者	社會主義	民主共和	交通機關
外交政策	社會問題	經濟競爭	國家思想

可見,《清議報》在三音節或以上的和製漢詞輸入中國的過程中,起了積極的作用。因為這種由兩個雙音節詞語構成的四音節詞語,不僅大量輸入中國,還對現代漢語的造詞方法,以及現代文學的語句結構帶來了莫大的影響。

此外,《清議報》從第 25 期至 100 期停刊為止,幾乎每冊都

有梁啟超執筆的《飲冰室自由書》，他在這段時期大量閱讀日語書籍，從中汲取新的知識。在他這些文章裏可以找到大量的和製漢詞，大多數情況下都是照搬日語詞彙^[43]。以下列舉的是《飲冰室自由書》中來源於日語的詞彙，共 75 個，這些詞同時被收錄在《漢語外來詞詞典》中，按日語的五十音排列為：

a 行	演說會	意識	演說	運動				
ka 行	議院	議會	關係	間接	公債	義務	機關	客體
	憲法	員警	原理	藝術	強權	具體	警官	革命
	教育	共和	禁止	階級	公債票			
sa 行	刺激	資本	資本家	自治	政黨	私立	宗教家	主義
	主體	實業	社會	政治	生存競爭	進步	社會主義	宗教
	手段	進化	政府	自由	主筆	世紀	政策	精神
	信用	心理	選舉	實業家	數學			
ta 行	知識	智識	探險家	探險	偵探	直接	哲學	
ha 行	文明	保險	法庭	美術家	文學	方針	霸權	美術
	舞臺							
ma 行	目的	民主						
ra 行	倫理	立憲	理想					

梁啟超在日本期間，以日本和日語為媒介，借用日語詞彙，大量翻譯介紹了“洋學”。這些詞彙輸入中國後經過一段時間被國人“消化”，逐漸被接受及流行，並成為現代漢語中的詞語。他在《清代學術概論》一書中自述：

務為平易暢達，時雜以俚語、韻語及外國語法，縱筆所至，略不檢速。學者竟效之，號“新文體”；老輩則痛恨，詆為野狐。然其文條理明晰，筆鋒常帶感情，對於讀者別有一種魔力。^[44]

他首創報刊雜文體，在《清議報》發表過不少犀利的雜文，並設立小說欄目，身體力行，大大提高了小說的地位。小說對梁啟超而言，不只是獨立自主的美學本體，更是用來表達作者思想，進而影響其讀者，使他們理解社會國家之現況與需求，並進而改良之的一種工具。梁啟超從日本的政治小說出發，翻譯介紹了日本的其他題材的小說，例如：科學小說、冒險小說、偵探小說、軍事小說等。而“報刊”則成爲他介紹宣傳日本文化、知識、文學、語言、文字的一個重要媒介。他對中國的語文文體、文學的貢獻是多方面的。他創造了獨特的報刊“新文體”——被譽爲“新民體”（粵語的“民”和“文”同音），風靡一時，不僅促進了當時的文體變革，也對“五四”白話文體的興起產生了一定的推動作用。這種新文體比傳統古文在語言上更加通俗，在詞彙方面更加豐富，在句法上更加靈活。新文體文白相雜，駢散相間，並常雜以俚語、韻語和外國語法，半文半白、半雅半俗、明白曉暢、接近口語。梁啟超在翻譯介紹日本的政治小說時，廣泛使用了這種“新文體”，後來“新文體”經過五四運動的改良，逐漸成爲“五四白話文體”。

清末的語言變革運動，爲文學革命的發生和中國文學的現代轉型提供了諸多思想資源和實踐準備。清末以來形式多樣的語言變革，其目的雖在求“文字簡易”以便“普及教育”，而不在文學本身，但其“文字救國”的觀念後來逐漸演變爲“文學救國”的現代文學功能觀。這確實說明清末以來的語言變革爲“五四文學”的先導，中國文學的現代轉型是一個漸進的過程而非突發的事件。

（作者：澳門旅遊學院旅遊高等學校導師）

注釋：

- [1] 前島密：《鴻爪痕——前島密自叙伝》，日本図書センター，1997年，第10頁。
- [2] 山本正秀：《前島密の言文一致創唱》，岩波書店，1965年，第92頁。
- [3] 同上書，“第一六章 明治二十一年前後の言文一致論争”，第213頁。
- [4] 劉金華：《日本“言文一致”運動再認識》（《深圳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第23卷第5期，2006年9月），第63—75頁。
- [5] 黃遵憲：《日本國志·學術志二·文學》，臺北文海書局，1974年，頁814—816。
- [6] 郭紹虞：《中國歷代文學論著精選（下）》，臺北華正書局，1978年，第353頁。
- [7] 山本正秀：《前島密の言文一致創唱》，“第九章 坪内逍遙の小説文體改良論と‘此処やかかしこ’”，“第一〇章 二葉亭四迷の言文一致活動”，岩波書店，1965年，第134、166頁。
- [8] 嚴家炎：《中國現代文學起點在何時？》，《社會科學輯刊》，2010年第4期。
- [9] 沈國威：《近代中日詞彙交流研究——漢字新詞的創製、容受與共用》，中華書局，2010年，第326頁。
- [10] 黃遵憲：《日本國志·凡例》，臺北文海書局，1974年，第4頁。
- [11] 朱京偉：《‘清議報’に見える日本語からの借用語》，《漢字文化圈諸言語の近代語彙の形成：創出と共有》，関西大学東西學術研究所國際共同研究シリーズ，第120頁。
- [12] 王照：《復江翊雲兼謝丁文江書》，《戊戌變法》資料叢刊，第2冊，第573頁。
- [13] 唯唐：《梁啟超與普通話》，《語文建設》，1984年第4期，第41頁。
- [14] 梁啟超：《飲冰室合集·文集四十四·上》，中華書局，1936年，第20頁。
- [15] 齋藤希史：《漢文脈の近代》，名古屋大學出版社，2005年，第109—110頁。
- [16] 梁啟超：《飲冰室合集·文集一》，第72頁。
- [17] 林正寬譯：Luis-Jean Calvet, *Les langues véhiculaires*, 《Que sai-je?》no1916, PUF, 1981, 《超民族語》白水社，1996年，第23頁。
- [18] 梁啟超：《沈氏音書序》，《飲冰室合集·文集二》，第1頁。
- [19] 黃遵憲：《日本國志》卷三十三，《學述志二》，第346頁。
- [20] 梁啟超：《飲冰室合集·文集一》，《變法通議·論幼學》，第54頁。
- [21] 梁啟超：《論譯書》，《飲冰室合集·文集一》，1936年，第76頁。

- [22] 梁啓超:《讀日本書目志書後》,《飲冰室合集·文集二》,1936年,第54頁。
- [23] 梁啓超:《論學日本文之益》,《飲冰室合集·文集四》,第81頁。
- [24] 陳力衛:《梁啓超の〈和文漢讀法〉とその“和漢異義字”について—“言海”との接点を中心に—》,関西大学東西学術研究所国際共同研究シリーズ6《漢字文化圏諸言語の近代語彙の形成—創出と共有—》,2008年9月,第423—462頁。
- [25] 夏曉虹:《晚清社會與文化》,湖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38頁。
- [26] 梁啓超:《論學日本文之益》,《飲冰室合集·文集四》,第81頁。
- [27] 清少納言著:《枕草子·第三段》,《日本古典文學全集》,1974年,第3頁。
- [28] 周聖來:《論白話文中的日語外來語是“和製漢語”還是“和製漢詞”》,《名作欣賞》,2013年10月,第165頁。
- [29] 山田孝雄:《国語の中における漢語の研究》,宝文館,1940年,第184頁。
- [30] 同注[27]。
- [31] 秦春芳:《近代中国語における日本漢字語借用に関する研究一定期刊行物の翻訳記事を中心に—》,広島大學出版社,2010年,第29頁。
- [32] 黄河清譯:《The Formation of Modern Chinese Lexicon and its Evolution toward a National Language: The Period from 1840 to 1898》,UC Berkeley,1993. 漢譯:《現代漢語詞彙的形成——十九世紀漢語外來詞研究》,漢語大詞典出版社,上海,1997年,第62頁。
- [33] 秦春芳:《近代中国語における日本漢字語借用に関する研究一定期刊行物の翻訳記事を中心に—》,第51—58頁。
- [34] 張春穎、王建華:《中國現代文學的現代性追求》,《新聞愛好者》,北華航太工業學院,2007年第6期。
- [35] 梁啓超:《本館第一百冊祝辭並論報館之責任及本館之經歷》,《飲冰室合集·文集六》,第48頁。
- [36]、[37] 沈國威、内田慶市、熊月之、王揚宗著:《欧化国家を目指せ:情報発信基地としての19世紀日本—日本新聞の中国語訳を通して見る近代日中語彙交流》,財団法人松下國際財団研究助成・研究成果報告書,1998年,第17頁。
- [38] 劉正琰等:《漢語外來詞詞典》,上海辭書出版社,1984年,第391頁。
- [39] “銀行はなぜ‘銀行’というのですか? また、‘Bank’の語源は何ですか?”

<http://www.boj.or.jp/announcements/education/oshiete/history/11100004.htm/>。

- [40] 曹濟平等校點：《宣和遺事》，江蘇古籍出版社，1993年，第2頁。
- [41] 蘭陵笑笑生原著、梅節校注：夢梅館校本《金瓶梅詞話》，里仁書局，2007年，第1048—1049頁。
- [42] 朱京偉：《〈清議報〉に見える日本語からの借用語》，《漢字文化圏諸言語の近代語彙の形成：創出と共有》，関西大学東西学術研究所国際共同研究シリーズ，第120頁。
- [43] 石雲豔：《梁啟超與漢語中的日語外來詞》，《廣東社會科學》，2007年，第137頁。
- [44] 梁啟超：《清代學術概論·儒家哲學》，天津古籍出版社，2004年，第142頁。

Discussion of the Spread and Influence of Japanese-made Chinese words in China: A Perspective with Huang Zunxian and Liang Qichao

Chao Seng Loi

(Instructor Tourism College,
Institute for Tourism Studies)

Abstract:

During the end of Ching Dynasty and the early Chinese nation period, Chinese literature has innovatively transited from classical language to modern language. In addition, massive Japanese-made Chinese words were imported to China during the Meiji restoration period in early 20th century. Huang Zunxian and Liang Qichao, the forerunner for the exchange of Chinese and Japanese culture, proved that it was an essential way to learn new knowledge outside China. The eventual influence of the imported Japanese-made Chinese words was on the attitudes of literary spirit and writing style. On the other hand, Huang and Liang, deeply affected by Japanese culture and literature, staying in Japan for around 4 – 10 years, published several articles. They can be served as a promoting drive of Japanese culture. This article discusses the role of publicizing Japanese-made Chinese words through observation of Huang and Liang's background and comparative studies of their pertinent literature and journals.

Keywords: Japanese-made Chinese words, Huang Zunxian, Liang Qichao, classical language, modern language